

今天我们如何书写乡村？去年获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的乔叶笔下的《宝水》，无疑是一个重要范本。她在一系列采访中都提及《宝水》的创作初衷——写历史背景下活生生的人。

“挖掘”具体而生动的人，似乎已经成为当下乡村主题写作者的共识。盛可以在新作《建筑伦理学》中，围绕主人公万紫回乡为母亲盖房这件事，细描母亲身边一众亲友以及众人之间微妙纷繁的情感连接；马金莲在《亲爱的人们》里讲西北小山村羊圈门马一山一家五口的人生故事，悠悠岁月，欲说当年，俨然就是一部乡村版“人世问”；魏思考在《土广寸木》中继续他当代乡村生活图景的呈现，将历史中面目模糊的村庄拆解为偏旁部首，那些不被历史记录的个人体生命就在这解构的笔画中恢复了个性化的主体身份；来自青岛胶州的书写者张金凤则在《村庄变身记》里尝试拓展散文写作的非

虚构边界，闪耀着各自精神光芒的人们成为她笔下的灵魂主角，她在散文的感性叙事与纪实性创作的理性真实之间，观察、记录自己熟悉的乡村世界的变与不变……

写作者们选择以各自的方式方法剖析今日乡村的肌理，那些鲜活的剖面样本中隐藏着对乡村生活具体而生动的注脚与解析。有关乡村的书写实则无须一味贴上“乡村振兴”的时代标签，如乔叶所言：她所关注的始终是村庄的历史与文化，寻求超越时代的纵深感。

乡土如此辽阔而丰厚，是灵感的自由沃土。彼得·汉德克在一首名为《走进村庄》诗歌里写道：“最主要的是要给自己时间，去走那些弯弯的远路。/不漏听每一棵树，每一片水。/在兴之所至处逗留，让自己享受阳光。”每一位乡村的书写者都会因此意识到：在乡村，我们离真实生活更近。



■作家盛可以为《建筑伦理学》所作插图。

今天我们如何书写乡村？虚构和非虚构写作者都在“挖掘”那些鲜活剖面中具体而生动的人——

在乡村，我们离真实生活更近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从乡村亲情出发，感受人们当下最真实的状态

在乡村，一切似乎都变得更加真实而又现实，尤其是亲情。这是盛可以在她的中篇小说《建筑伦理学》中试图告诉我们的。

在这部同名小说集里，中篇小说《建筑伦理学》占了半本书的篇幅，讲述女儿万紫在父亲去世后，回乡为母亲重建老房的过程。“亲情是一座富矿”，同时也是光秃秃的经济荒山，她从没想过去那里挖点什么，但这次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小说从万紫决定与当家大嫂阿桂谈谈开始，于是，猜疑、纷争、亲情崩盘、返乡者的身份、女性在原生家庭的地位等等问题，伴随亲戚们的出场纷至沓来……在盛可以看来，盖房是深度刺探乡村世情伦理的一块“试金石”，在一砖一瓦的增减中，世俗的亲密关系或被还原、或被放大、或被扭曲，“万紫感到自己用真实的肉身演绎了一部小说，获得了仿如虚构的躁动与悲伤”。

小说取材于盛可以回乡的真实经历，她在书的《后记》里写道：“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回乡建房，从构思、画平面图、找施工队、洽谈、自购部分建材，到园林构建、装修设计，历经严寒酷暑，下泥坑、上屋顶、统筹、处理纠纷、调整关系，一砖一瓦，全过程亲历，事务复杂琐碎，相当于一部电影的制片人。”小说里的21个章节完全按照盖房子的工序流程，从基础、结构，到最后的封顶，标题都是建筑术语。随着盖房的过程推进，亲人、相关者纷纷登场，作家邱华栋用四个字概括作者精心塑造的这些人——“真实可感”，“他们当然是文学画廊里的人物，每个都是栩栩如生、表现不一、有所区分，是非常鲜活的文学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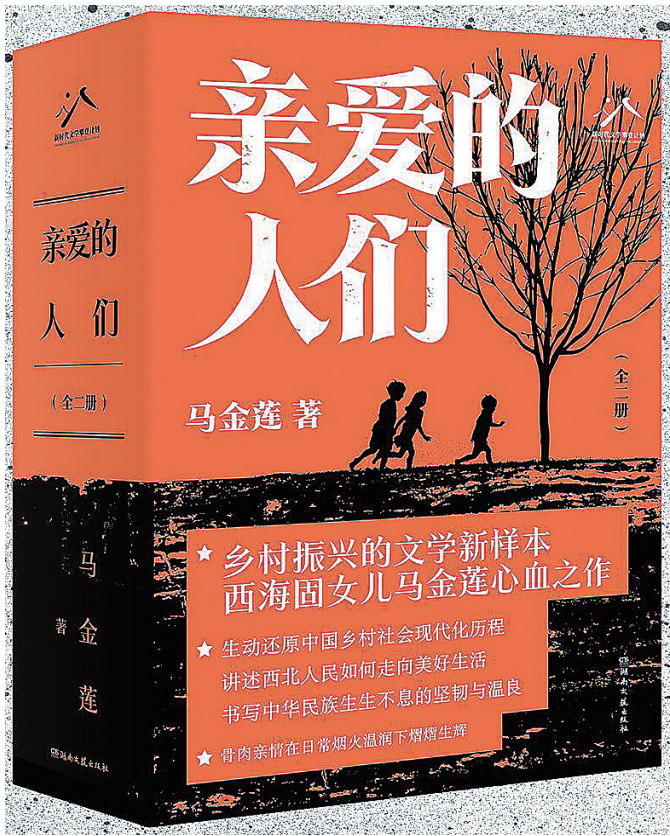
而作品里丰富的情感，算计、宽恕、和解、理解、纠结等等表达，也让邱华栋感同身受，“这大概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会体会，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在一个伦理结构中所表现的个性的丰富和复杂。”亲情的本真面目，在乡村、在原生家庭里，在文学作品里似乎更容易共情。而透过亲情，我们也感受到了当下人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沉重的生活未必值得感谢，但它依然被人赤诚地热爱”，这或许就是中国式关系、中国式生活的来源。如同小说开头万紫的“糍粑心”，“要怪就怪我有一颗糍粑心，非常软、非常黏的糍粑心”，在乡村，在最真实的“中国式亲情”中，恰恰是“糍粑心”把各种坏事、麻烦都揽到女主公身上，并帮助她最终与岁月、亲情、命运和解。正是相同的“糍粑心”，让我们每个人对亲人以及世界的理解都更加深沉和宽容了。

以人物纪录片的方式，拆解现实中的村庄

将“村庄”二字拆解开来，其中包含了百余人物，年岁时节，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每一张面孔都有无尽的故事。这是作家魏思考在《土广寸木》中所做的事。他笔下的村庄“辛留村”，承载着每一个面对生活不堪重负的人的真实处境：行将就木的小民，无聊的混混，飞黄腾达的官员，勾连出辛留村的人物谱系与世事百态；下篇“一年”里，则以老付与“我”母子的生活为主线，记述村庄一年内发生的大小事务，是关于村庄全景的真实样貌。

很难界定《土广寸木》是虚构抑或非虚构的书写，它就如同一部当代乡村的人物纪录片，充满对于人物的切近细致的观察和深刻具体的观照。在小说的后记里，作者本人也带着些许的迷茫：“若把我这本小说，和过去几年的乡村题材小说进行对



《亲爱的人们》马金莲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4.07

照。‘辛留村’仍旧是重要的发生地，《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里的人物，继续在串场，留下自己风尘仆仆的身姿。在进行了长达四五年的写作之后，我自然陷入了一种疲惫。好在经过一年的修整（2021年完成《沈颖与陈子凯》），发现乡村题材（以我的经验）还有更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在豆瓣书友的品评中，《土广寸木》被看作是“乡村版、群像式的《活着》”。魏思考为那些出生于乡村、经历生活捶打的无名之辈赢得了某种文学意义上的存在方式。

在人间烟火的温润中，还原乡村的生生不息

如果《土广寸木》是一部乡村版群像式的《活着》，那么马金莲笔下的《亲爱的人们》就是一部乡村版的《人世问》，它真实描绘了中国曾经最贫困地区逐步摆脱贫困的历史图景，图中景象并没有什么宏大叙事，而是一群性格坚韧、温良的平凡者在日常烟火中的暖心故事，

“羊圈门”是一个充满阳光、生生不息的乡村读本，在这部篇幅七十余万字的长篇中，作者就像解剖麻雀一般真切描写这个不起眼的西部小山村，带读者回到童年记忆的时代，马一山一家人的日子，像是岁月中缓缓流过来的汩汩清流，在这里，村民以传统劳作和生活方式积淀历史人文的厚重。马金莲诚恳讲述悠悠岁月，为那里每一位生活着的人撑起一把伞，既可遮烈日，又可挡风雨，这些扑面而来的温情暖意同样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正向流入读者的内心。

评论家贺绍俊说：马金莲毫无距离感地生活在她所叙述的人物中间，体贴他们，心疼他们，善良地为他们开脱，热切地期待他们幸福，这是她的写作姿态，因为这种姿态，使她看似客观的叙述具有了一种强大感人的力量。小说并不刻意地要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却成为了乡村振兴主题作品中最有说服力的文本。

在一群灵魂闪光的人们身上，发现乡村的变与不变

同样提及“乡村振兴”，《村庄变身记》之于张金凤，最初或许只是一次主题先行的常规写作，然而她却却在熟悉的乡土发现了新的“风物”。

近20万字的书写，人物成为作品的灵魂，张金凤说，她选取人物的标准取决于人

物所呈现的故事和精神世界，引发的思考和对于历史和当下的意义。他们中有乡土中摸爬滚打的乡镇干部，带领村民精神物质双致富的村干部，规模种植业主、新理念渔民、知足创新的养殖户、多重身份的乡村歌手、身残志坚的小镇居民、坚守山野的天文科研者……他们挑战诸多不可能，既顺应时代潮流，又不受裹挟，闯出一条自己的路。他们虽都是立足乡村的平凡人，却以自己的情怀谱写乡村变迁的独特篇章。

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身上呈现出乡村的变与不变——看似格格不入的坚守者，恰好对应村庄变迁的滚滚洪流，比如农业机械化的背景下刁家屯的一位养马人；乡村人大规模走进城市后黑山前一户人家的农业田园；只投钱不见收益的荒山绿化者；多次变卖家传物件开办家庭书屋的退休教师……在张金凤看来，这些人物都以自身的光芒被发现，以其独特的情怀把她感动，这些构成了她书写的基础。

一场主题先行的写作，总免不了陷入就事论事的单一层面，而张金凤笔下的人物，拒绝脸谱化和同质化，她会把同类人物放在不同的村庄和背景下写作。比如写村干部，她写一个充满管理智慧的河西郭村书记，也写一个努力矫正落后面貌的西蔡家村的女书记，他们的村庄历史和背景存在极大差距；写村主任，把他放在村庄的特殊气质中去考量，写村党委委员，突出的是她爱生活、爱歌唱的特点。这四个身份接近的人物因此生动而独特；她还特意将有些人物放在村庄历史中去书写，以此增加历史纵深感。此外，风俗和观念的演变探源，也有效稀释了人物密集撑不开空间的局促。

张金凤仍将《村庄变身记》纳入她所熟悉和擅长的乡土散文写作的范畴，她亦毫不讳言，传统的乡土散文大多是保持着时空距离的写作，比如写农耕时代的乡村，多以田园牧歌形式呈现；写乡村生活的辛苦，又往往以偏概全夸大苦难和愚昧。很多呈现是作者一厢情愿地回忆过往，筛选的过程中又雷同地美化了过往。而《村庄变身记》想要尝试不同。

以真诚与真实为前提，张金凤就如同彼得·汉德克诗歌中所写：“最主要的是要给自己时间，去走那些弯弯的远路。/不漏听每一棵树，每一片水。”走进村庄的她，途中遇见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观察、记录下乡村真实生活的种种。她的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没有距离，因为她走进的是自己想要书写的生活，无须考虑自己与真实生活是否更近，那些人物和故事就会汹涌而至。而她只需在兴之所至处逗留，感受来自那些灵魂闪光者的温暖照耀。

《村庄变身记》：乡村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冯强

张金凤的纪实散文集《村庄变身记》是2020年青岛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由山东省作家协会择优上推，获评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2023年11月，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将这部作品出版。从立项到结项，大概用了三年时间。项目压力的存在督促作者深入反省自身与村庄的关系，自序中她写道，“近年，我的乡村题材创作面临新课题，即怎样融入生活，反映当下。这对我是个挑战。我以此为契机，更多地深入地去聆听乡土故事，去发现动人的风景，去淘沥生活的金子。作家不是坐家，不是只坐在电脑前的写作者。”

项目式写作算是中国一个小的传统。根植于庞大的作协系统，一些作品是以“项目”的方式来完成的，从丁玲、柳青、周立波那一代开始，作家带着任务进入某一个社区“深入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近距离观察和体会，完成国家的“订货”。这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过程，它首先要要求作家走向田野，而不是面壁虚构。但即便在一线搜集了足够多的一手材料，也未必能写出有现实感的作品，因为项目式写作要求作家携带某种理念去理解生活，而生活的斑驳多彩、人心和世情的复杂多变可能让这种理念失效，从而降低作品的可信度。

《村庄变身记》让我们看到项目式写作的另一种可能。张金凤的老家在村庄——铺集镇位于胶州市西南部，地处胶州、高密、诸城三市交界中心，因其距三州县各七十里，又是明清至诸城的驿递铺，又称“七十里铺”“三七铺”。《村庄变身记》则以胶州村庄书写为中心，辐射青岛辖域的平度、莱西、即墨、崂山、西海岸新区等，日照五莲、潍坊安丘也被纳入进来。全书书写了几十个村庄和人物，其中有村书记、村主任、村干部、渔民、科研工作者、镇长、种植园主、农民歌手、养殖户、荒山开垦者、非遗传承人、书香使者以及人力经纪等，共计36篇。这些人物是我们这个时代村庄的缩影，生动地告诉了我们这些年村庄发生的巨大变化。

然而张金凤并不满足于主流叙事，她要写的是村庄的方方面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也有精神、文化和科技等诸多方面：《人力经纪》写“经纪”这一城市经济现象进入村庄后引发的人情世故上的不适应；《古风张家楼》则写一位颇具个性的乡镇长张胜男，以及改名“达尼村”的大泥沟头村如何成为江北第一画家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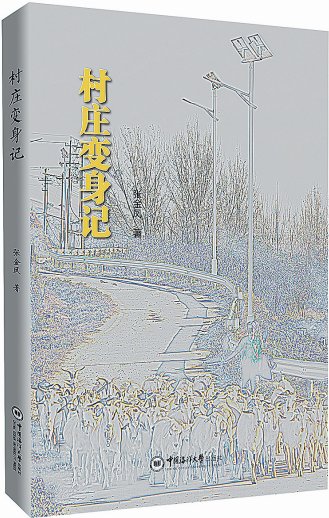
最让我欣喜的是《星光引路》，写在城市出生长大、又做过12年记者的天文爱好者周昆，出于热爱和责任，辞掉工作，卖掉青岛的房子，把所有财力投入胶州洋河的艾山，建起了自己的天文台……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星光引路》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村庄叙事，让我们看到村庄除了三农问题，也可以在科学领域有一番作为。“……在天文台的带动下，洋河镇从一个单纯的农业小镇上升为天文小镇。”能在农业和致富问题以外投入，新农村就不应该有这份眼界与心量吗？

《村庄变身记》是纪实散文集，张金凤得心应手地把不同村庄、不同人物汇聚到一起，让人欣喜。我的建议是，是否可以在日后增加此类写作的项目集中性，比如能否把《星光引路》扩展为一本书？当然，这需要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比如继续追问周昆为什么放弃了他同样热爱的记者工作，比如学习更多天文知识，等等。此类案例其实有不少，比如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用半年时间兼职卖烤串，并以此作为介入社会的窗口——遗憾的是他没有写成一本书。

另外，能否以更为总体性的视野来审视村庄？比如梁鸿的《出梁记》，第八章专门写青岛，其实主要是胶州一个叫“万家窝子”的村庄，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村庄的另一面。一次演讲中梁鸿提及她和父亲从河南老家赶到万家窝子，和失去儿子的堂婶躺在一块床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张口。可能这个话就在地嘴边，她一直等着人来问她，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问她，她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机会来说话。那天晚上我没有拿电脑、录音笔，第二天早上我爬起来，然后就清清楚楚地把她的话打了出来。我觉得到今天，她的话我几乎还是可以背出来的。”梁鸿这段回忆至今令我感怀，因为她记录下我们村庄的另外一种历史。

这些年，一种类似于纪实散文的、介于新闻和报告文学之间的非虚构写作兴起，正应了张金凤那句话，“作家不是坐家”。当代作家尤其需要离开自己的房间，走向更辽阔的田野。无论是作协系统之内还是之外，记录世事人心、书写相对更好的共同未来都是我们无法推卸的责任。

（本文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村庄变身记》张金凤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23版



《宝水》乔叶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3版



《建筑伦理学》盛可以 著 作家出版社 2024.06



《土广寸木》魏思考 著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4.04